

国际思想大师

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

(中译本第二版)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

约翰·考特尼·默里

马丁·怀特

巴里·卡爾

汉斯·摩根索

尼古拉斯·斯拜克曼

阿诺德·沃尔弗斯

约翰·赫茨

卡尔·多伊奇

沃尔特·李普曼

乔治·凯南

路易斯·哈利

雷蒙·阿隆

昆西·赖特

戴维·米特兰尼

查理·德维舍

阿诺德·汤因比

Mast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Major Twentieth-Century
Theorists and the World Crisis

[美] 肯尼思·汤普森 (Kenneth W. Thompson) 著
耿协峰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际思想大师

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
(译本第二版)

Mast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Major Twentieth-Century
Theorists and the World Crisis

〔美〕肯尼思·汤普森 (Kenneth W. Thompson) 著

耿协峰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3-211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思想大师:20 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美)肯尼思·汤普森(Kenneth W. Thompson)著;耿协峰译.—2 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7

ISBN 978-7-301-28355-4

I. ①国… II. ①肯… ②耿… III. ①国际关系学—思想家—评传—西方国家—20 世纪 IV. ①K8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9644 号

MAST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Major Twentieth-Century Theorists and the World Crisis
by Kenneth W. Thompson

Copyright © 1980 by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国际思想大师:20 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中译本第二版)

Guoji Sixiang Dashi: 20 Shiji Zhuyao Lilunjia yu Shijie Weiji

著作责任者 (美)肯尼思·汤普森 著 耿协峰 译

责任编辑 徐少燕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355-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62753121

印刷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7 印张 218 千字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2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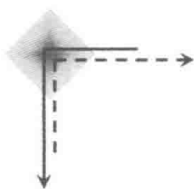
定 价 4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前言

爱默生曾写道：“宁赏一尾大鱼跳，不捉一串小鱼苗。”本书所写的人物，无一不有着广博的思维、开阔的视野，堪称国际思想界的“大鱼”。笔者按照国际问题研究的四大领域来讨论他们，即：规范思想、欧美的权力与政治观念、冷战冲突分析和世界秩序理论。笔者分析、探讨了这些思想家的主要研究方法、教育背景、理论前提和假设、理论概念、价值体系、思想发展阶段、他们对公共政策的贡献以及对未来的远见卓识。此外，笔者还讨论了那些影响了这些人物的其他思想家。在写作本书时，笔者所根据的是这些人物的著述、随笔、其他人对他们作品的批评与辩护、答记者问、回忆录、往来书信以及笔者本人与他们中的一些人的个人交往。在论述每位思想家之后，书中还开列了他们各自的主要作品以及对他们进行评论的作品的目录。

笔者写作此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与人共享国际关系学界领军人物的智慧与学识。他们的作品在过去三十年间使笔者目睹了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所以笔者挑选他们是有一定理由的，对此，别人可能会争论、批评甚至摒弃，但就笔者判断，无论我们要理解国际政治还是要建立一个具有活力、条理清晰的思想框架，他们的作品都是至关重要的。国际研究著述有时被认为不过是高级新闻编辑，也有人说国际研究不过是美化时事。本书所讨论的每一位作家都曾在国际研究领域中对某一个有组织有系统的思想方法做出过贡献，其

思维模式都可以应用到对某个长时期内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和事件的分析上。

这些思想家的作品有着经久不衰的价值，让笔者难以抗拒。挑选并评价他们的作品不能够依照许多出版商和读者所用的营销成功与否的标准。本书所选的作家中几乎没有人曾经上过畅销书排行榜。除了一个例外，他们中也没有人获得过“每月一书”奖。然而，他们不像某些作家那样被描述为“麦迪逊大街制造”^①，这些思想大师的作品，甚至他们在五十年以前写的一些书，仍在决策者和学者中间被广为阅读。

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挑选这些人显然既有客观依据也有本人的主观偏好。指出一些看起来客观的重要性标准是完全可能的，但不同的评估者对这些标准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个客观标准就是这些作者的著作目录。尽管有些目录比别的要长，但每个目录中都有一大串精心挑选的重要作品。记者和学者们引用或引证这些作者，在谈到他们著作的重要性时，那肃然起敬的情形，恰如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在其专栏中向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爵士，或者戴维·布罗德（David Broder）向汉斯·摩根索，经常表示敬意时一样。另一个客观标准是学者的评论和学术会议上的反复讨论。第三个标准是学位论文、期刊文章，如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在《代达罗斯》（*Daedalus*）1987年春季号上发表的“国际研究述评”，以及为纪念某个学者而出版的纪念性文集等。写作方家经常可以激起争鸣，也可能开辟新的研究园地，为思想界带来一个又一个“突破”。他们具有开创性的影响，并且当那些更时尚却更短暂的研究方法风行过去之后，他们仍旧能够备受青睐、历久弥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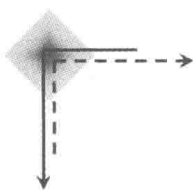
岁月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严格而准确的评估方式。某家期刊可能会不在意一位作家，某一出版商可能会拒绝出版他的作品，某一作

^① 麦迪逊大街是美国纽约市的一条著名街道，它是美国各大广告公司、公关公司的集中地，因此人们常用此街名来表示这些公司的业务特色。——译者

品选集也可能会将他遗漏,甚至某些腐儒会对他的作品横加指责。然而,在文学界和哲学界,尽管岁月迁延,读者仍在阅读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在阅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阅读霍布斯和洛克。这里所论的思想大师及其作品可能无法与莎士比亚这样的不朽巨匠相提并论,但是很显然他们的作品仍为当代思想界所继续阅读。当《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为了评述过去 25 年到 50 年间的重要人物而挑选值得重视的思想家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总是位列国际关系类作家名单的前茅。在那些编制这种思想大师名单的人看来,他们的作品显然具有经久不衰的价值。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要估量这些思想家中某些人的影响力也许还嫌太早,还没法判断他们的作品是否经受得了时间的考验,因为它们差不多都是最近的作品。正规的国际政治研究在学术园地里还是一朵蓓蕾。当然,像沃尔特·李普曼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等人,他们的作品将来在学术文献中注定会占据一席重要位置,这绝非凭空妄言。

说到这里,笔者还应该承认,本人挑选这些作家时并不排除主观因素在内。笔者不仅了解这些思想家的作品,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跟这些人还很熟识。任何学术性的评价都难免掺入个人的偏好因素,因此在这里笔者也不否认个人因素的影响,否则就是自欺欺人。但是,不论他们的贡献有多大、他们的个人魅力和影响力如何,笔者都没有因此而回避针对他们个人和他们学问的批评。在笔者看来,他们虽然大都是学问上的巨人,但他们毕竟还是人,不是神。如果笔者有过誉之处,还请他们宽容;如果笔者的批评有所不公,也请他们原谅。他们的学术信誉为笔者树立了榜样,促使笔者谨守诚实与坦率,笔者确信,对他们的伟大之处绝无盲目崇拜,更不至于顶礼膜拜、丧失原则。



目 录

第一部分 探求政治的规范基础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1900—1979)

历史大视野 5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1892—1971)

由神学到政治审慎 19

约翰·考特尼·默里(1904—1967)

基督教与战争 38

马丁·怀特(1913—1972)

西方文明的价值 47

第二部分 权力与政治

E. H. 卡尔(1892—)

无处不在的权力标准 71

汉斯·摩根索(1904—)

政治现实主义诸原则 85

尼古拉斯·斯拜克曼(1893—1943)

地理与权力 98

阿诺德·沃尔弗斯(1892—1968)

概念化与寻求共识 103

约翰·赫茨(1908—)

调和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 115

卡尔·多伊奇(1912—)

政治研究的科学方法 121

第三部分 冲突与当前危机

沃尔特·李普曼(1889—1974)

理性主义与政治理性 133

乔治·凯南(1904—)

挑战法制至上和道德至上主义 150

路易斯·哈利(1910—)

从历史看危机 166

雷蒙·阿隆(1905—)

冲突与社会学的想象力 177

第四部分 世界秩序理论家

昆西·赖特(1890—1970)

非同一般的战争研究 191

戴维·米特兰尼(1888—1975)

以功能主义超越政治学 211

查理·德维舍(1884—1973)

世界秩序与法律现实主义 226

阿诺德·汤因比(1889—1975)

世界文明与世界政治 235

第一部分

探求政治的规范基础

在探求政治的规范基础的人中,神学家和宗教史学家无疑是走在最前列的。当然,并非任何宗教传统都鼓励人们去关心道德与政治。有些宗教传统视政治为生命的另一种重负,人类必须泯灭对尘世的关心才能免除它。比如佛教人士就追求走向涅槃,进入极乐世界,享受那种一切皆空、无争无欲的境界。但是在大多数西方宗教传统中,仍认为,人生天地间,就注定要经受生命中无休止的道德与政治困境的磨炼。

尽管西方宗教教导人们生为今世,也生为来世,但是,当代宗教思想家中,其著作作为研究道德与外交的学者所一读再读者,仍在少数。原因之一可能是,国际领域错综复杂,要深入其中必须精通对外事务,而这只有为数不多的伦理学家才做得到。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宗教学家们纷纷想做社会改革的先驱者,热衷于从事十字军东征一样的社会政治运动,他们认为那才有意义,哪怕总是瞬如流星。宗教思想家们对政治的关心常常表现为逃避,他们关心的是恒久真理的崇高的精神依据,或者干脆就加入到那奔涌的社会改造洪流中去,而把那种是非难分、善恶难辨的严酷的政治任务留给了世俗领导者。

幸运的是,大凡从事政治伦理研究的观察者都能够指出,在这几种宗教传统中尚有一些人物是例外。那些非宗教的政治作家以及政治科学家一说起宗教作家来,就认为他们不过是布道士。这种断言

给信教者和作此断言的人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在冲破宗教正统学说的桎梏之后，现代非宗教思想家们竟然又企图自欺欺人，对宗教思想所做的贡献熟视无睹。对于一个开放的、有理性的社会而言，吸收那些由主要宗教传统中大师级的学者所贡献的真知灼见，应当如欣赏最优秀的世俗思想中的聪明才智一样，都是义不容辞的。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教条主义，都会践踏思想自由。追求健全政治伦理的人们必须追随真理，不论真理引领人们去向何方。

在国际伦理学方面著书立说的宗教史学家中，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爵士卓而不凡。在发表《辉格党人的历史观》一书之后，巴特菲尔德奠定了他在英国传统历史著述中的不朽地位。在那之后不久，他转向宗教史学，写出了《基督教与历史》《欧洲历史上的基督教》《基督教、外交与战争》等著作。此外，巴特菲尔德还通过由他创建于剑桥大学的“国际政治理论英国委员会”的工作而将其学术影响扩大到政治伦理学之中。尤其突出的是，巴特菲尔德及其伙伴们在理解冷战的伦理方面、在讨论“均势”这样的经典概念上，也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照乔治·凯南的话讲乃“众家之父”，曾就当代国际政治著书立说。这位卓越的神学家对近来的知识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任我们怎样形容都不为夸大。沃尔特·李普曼在评价尼布尔的贡献时问道：“要经过多少世代我们才会再见到一位像他这样出色的人呢？”在其海量的专著和论文中，尼布尔所发掘的是他所谓“基督教现实主义”在应用于国际政治时的主要基本原则。他的著述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曾一度被基督教徒和社会活动家所忽视，但在 70 年代末期又被重新发现。任何人在探求条理清晰、一以贯之的政治伦理研究方法时，都无法绕开他的作品。

在近来关注伦理与现代战争的罗马天主教作家中，约翰·考特尼·默里牧师超群出众。尽管默里把他的国际伦理学作品归入到研究道义与政府的更宽广思路之中，但他仍值得我们关注，而且仅靠本

书对其思想的简明介绍还远远不够。在研究道义与外交的学者中，唯有默里将其思想建立在古时受尊崇的罗马天主教自然法传统中，对这种传统笔者毫无造诣，无法据之对他做出完全公道的评论。

我们有必要转到一位英国学者身上来结束对宗教思想家们的回顾。马丁·怀特英年早逝，所遗作品无多，但是他的影响却因有大批受其鼓舞的后学而长存于世。他既是一位历史学家，又是一位国际政治学家，他在学术上的著述虽稍逊于巴特菲尔德或尼布尔，但仍有着一不朽的价值。他的一些作品是在他身后经由同事和学生的忠实努力而得以出版的。他比任何现代作家都更加致力于在伦理学基础上重建当代思想，使之继续沿着西方文明传统演进，而遵奉西方文明传统，是他至死不渝的信念。

在一部介绍这些宗教思想家著述的书中，不可能全面概括他们思想的异同。作为历史学家的巴特菲尔德始终坚守历史学学术的牢固阵地与根本原则，从未曾涉险远离。从尼布尔和默里的著述看，他们自始至终都主要是神学家，虽然他们更关心当代紧迫性社会政治问题，而并非经院式的神学家（尤其是尼布尔）。至于怀特，他所关心的焦点时而为欧洲史时而为当代史，反映了他对古典思想和现时国际政治的一贯兴趣。

尼布尔和默里两个人经常就自然法的实用性及其应用于核时代的问题争论不休。这四位思想大师都认识到了当代国家间关系的非理性，但是默里比其他几位更加认为，传统的自然法可以为国家间关系提供行动的持久准则。他们四位没有人质疑宗教对国际政治的终极意义，尽管他们每个人都依照自己的方式来界定这种意义。

显然，对这些大师和其他大师思想的介绍无法取代对他们的作品文本的细致披阅。笔者仅仅是想向大家介绍这一类思想家——介绍他们的著述、他们关于人和政治的基本假定、他们关于国际体系性质的界定以及他们对国际政治规范结构与对权力的作用和限度的观点。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1900—1979)

历史大视野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于1900年10月7日出生在英国奥克森霍普一个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家庭。奥克森霍普是一个经历了工业革命的乡村,有居民两千人,坐落在荒野沼地的边缘,距离兰开夏与约克夏两郡交界处有几公里。巴特菲尔德的父亲10岁时就辍学做工,在毛纺厂里当羊毛分拣工,但他父亲通过自学把自己培养成了一名簿记员。他父亲的野心是当一名卫理公会派牧师,但却抱憾终生;因此,老巴特菲尔德自然而然地就把这种野心寄托在儿子身上,希望儿子能向那个方向发展。部分是为了让父亲感到高兴,赫伯特从16岁起就当上了一名非神职传教士。这一步曾引起当地文法学校里那个最激发他上进的老师的不安,那个人特别直言不讳地敌视基督教。后来当巴特菲尔德在剑桥大学跟随著名历史学家哈罗德·坦珀利(Harold Temperley)工作时,他对历史的兴趣日增,他也意识到自己过于腼腆而在神职工作上不会取得成功,因此,年轻的赫伯特就打消了当牧师的愿望。尽管宗教和政治思想家总是会背叛他们童年时代的



信念,但巴特菲尔德却相反,从未动摇他对奥古斯丁神学基本教义的信仰,包括相信人格的永恒价值、罪恶的存在、神权至上、人性的弱点以及人类存在的片面性质。他从未像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和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这两位与他有着某些相似之处的哲学家和神学家那样赞同过马克思主义,但他却钻研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且从中汲取过一些有关历史上的矛盾斗争和历史上的经济社会因素之重要性等方面的见解。他的思想焦点主要针对的是英国史、基督教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国际关系理论。

然而,受其童年时代及家庭生活的启蒙影响,巴特菲尔德本来可以具备作为一名剑桥大学现代史教授和《剑桥历史杂志》编辑所必需的传统史学造诣。他就读于剑桥,拿到了文科硕士和文学博士学位。1923 年他成为该校彼得豪斯学院的一名教员,1955 年任该学院院长。20 世纪 60 年代末,他任英国历史学会会长,并且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身份受聘进入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他的处女作《历史故事》(1924)反映了他对文学与历史关系的早期关注。在这本书中,他向人们展示了文学的想象力在推动真实再现过去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假定发生在另一时代的事情可以置于当前或不久前的境况下加以理解,那就是一种时代错误。历史学家运用文学的(除了诗歌的)技巧所创作的短小精悍的作品有助于再现过去的历史。这成了巴特菲尔德几乎所有著述的标准。在第一部书之后,他又发表了一部详细分析研究拿破仑时期军事与外交策略关系的著作《1806—1808 年拿破仑的和平策略》(1929),其中还论及了 1807 年的《提尔西特和约》。评论家们赞赏他对历史所作的生动描述,认为他反证了德意志历史学家宣称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曾经阴谋背弃英国,相反,是普鲁士人说服沙皇去涅曼河中的一个小木筏上与拿破仑会晤的。他编辑了《欧洲历史文献选(1715—1920)》(1931),并开始对乔治三世(George III)进行研究——这是他一生的兴趣所在,出版了《乔治三世、诺思勋爵与人民(1779—1780)》(1949)和《乔治三世

与历史学家》(1975)。他本来有意撰写关于查理·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和乔治三世的纪实性著作,但是却因对分析性史学研究发生了新的兴趣而放弃。这一新的兴趣主导了他此后四十年的研究工作。

帕特菲尔德明显地超越传统史学研究范围的第一个证据是他1931年发表的《辉格党人的历史观》。这部著作批判地分析了辉格党人和自由派对历史必然进步性的观点,其中分明体现了他对批判性写史方法的关注,这也为他赢得了作为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天才的荣誉。尽管该书批判了自由派政治学和历史上的新教教义,但帕特菲尔德用一种更加根本的方式拷问了历史学家们,认为他们没有能够公平地对待以前时代的特殊历史条件和思想状况。在该著中,帕特菲尔德显然宁愿步阿克顿(J. E. E. D. Acton)(尽管他是帕特菲尔德的一个主要批评对象)和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之后尘,也不愿再继续像传统的英国史家那样专注于对历史的描述了。他其后的著作,如《拿破仑》(1939)、《英国人及其历史》(1944)和《马基雅弗利的统治术》(1940)等,更进一步地使他走上了历史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之路。

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帕特菲尔德已被公认为一流的英国史学家,其声望显赫,无人质疑。此时受世界危机的激发,他进入了其史学著述的第二阶段。1939年,他在四所德国大学讲授史学史,并着重于16世纪和17世纪的史学发展。他提出,是他所批判的辉格党历史学家,而非辉格党政治家,培育了查理二世后期的自由和克制。他在讲课中畅言道,虽然他仍旧认为辉格党人对历史的诠释是荒谬的,但是他相信,这种诠释有助于自由在英国的发展。歪曲历史的,是辉格党历史学家,而不是那些采取政治上的妥协和说服而非强迫和武力的辉格党政治家。

1948年,他转向了宗教与历史,在剑桥大学神学院的要求下连续做了七场讲座。1949年4—5月,他将这些讲座扩展为六篇广播稿,

由英国广播公司(BBC)加以广播。他还将这些讲座的主要论题加以详述,编著成书,题为《基督教与历史》(1949)。巴特菲尔德曾经对做这些讲座表示过犹豫,因为他担心作为一个平信徒自己没有资格准备这样的讲座,并且他深知这样一项工作会在他的史家同行中激起怀疑。但是,当邀请他的神学院的代表向他说明,他们认为本科生们肯定会更乐意听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而非一位牧师的演讲时,他就难以拒绝了。巴特菲尔德之转向哲学问题,无疑是受到了西方所面临的双重危机的激发。这种双重危机是:苏联及其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带来的巨大挑战和西方国家作为“惊恐万状的现状维护者,坚守着一种古老的文明,对抗着某些新事物的侵害”^①而陷入的困境。巴特菲尔德警告说,对某个超人、某个社会、某个国家或其他大型组织的过度尊崇会使人类的视野发生改变,以至于人类可能将自己的世界比之于蚂蚁的世界。回避历史或者幻想让自然科学来决定人类的命运,都是危险的。指望上帝或人类天性,或者像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那样下断言,也无济于事。希特勒认为,既然自然造化关心的不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命而是作为种群的人类的发展,那么历史也就难免要施予生命以酷刑、膜拜和牺牲。这种人生态度被巴特菲尔德描述为“科学时代里自修者极易中招的异端邪说”,他忠告人们:“我们可能太轻易地认为人类不过是最后一种动物而已,于是也就同样轻易地得出结论并诱使我们将它转换到人伦关系的世界中去。”^②《基督教与历史》反复强调,作者对人格在历史进程的中心位置深信不疑。他反对某些行为主义社会科学家和博物学家所持的观点,他们认为历史就是许多集体人群的经历,应当通过科学和数学予以研究,这并不比研究生物学宏著的又一章内容更复杂。

巴特菲尔德将这种批判加以详细阐述,并有所拓展。在一连串的著作中,他重申了这种基督教历史观,其中还申明,他并没有像阿

① Herbert Butterfield, *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London: G. Bell, 1949), p. 5.

② Ibid., p. 6.

诺德·汤因比那样以一位神学家的口吻讲话,而是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身份在讲话。他独立写作,不与其他历史学家和神学家交流,也不像汤因比那样提出一份周详的历史研究计划。他的目标,正如他设想的,就是要同时向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徒提出挑战,使他们重新认识基督教观念的历史地位。他后来又出版了《欧洲历史上的基督教》(1951)、《历史与人伦关系》(1951)和《基督教、外交与战争》(1953)。无论批评家就他的基督教历史观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巴特菲尔德都毅然坚持认为,从最广阔的视角上看,历史是与一种基督教历史观相一致的。他曾经抨击过技术性史学,认为这种历史学不足以精深地理解过去。历史学原则上要求历史学家做到理智而谦逊,并且头脑要灵活;他必须与历史人物并肩而行,设身处地,努力再次体验他们对事物的感受,并试图理解各种他们不得不应付的问题。

巴特菲尔德另一方面的贡献源于他对科学的研究。自1931年始,他就为剑桥大学的大学生们讲授1492年以后的现代史,专注于像文艺复兴、法国大革命这样较大的历史发展和长时期的运动以及这些运动的相互联系。他在方法上以阿克顿勋爵为榜样,反对过度专门化地讲史,而这种过度专门化的讲史方法已经主导了大学的现代史教学,它采用教学大纲和干巴巴的教科书来讲授国家的对外关系。相反,他着重讲解的是现代世界和现代思想的起源及重要发展,比如他曾就现代科学的兴起做过大约六场讲座。这些讲座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杰出的剑桥科学家,像李约瑟及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人,他们也正要在历史学家中寻找一位同道者。在这些人的影响下,1947年剑桥大学成立了一个科学史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经过相当大的争执后,说服巴特菲尔德于1948年第一学期开设一门讲授科学史的课程。此课程促使他出版了其最为成功的著作——《现代科学的起源》(1949),并在英美两国重新激起了对科学史这一主题的兴趣。该委员会引导那些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参与严肃的历史研究,并推动了一代新的科学史家的诞生。